

國內郵資已付
中華郵政北台
字第 7502 號
執照登記為
雜誌交寄

(限向郵局窗口交寄)

雜誌

143期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九月
第一四三期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

SEPTEMBER 2022 NO.143

目 錄

專 論

1 美中相關議題對話與後續發展觀察

■ 吳崇涵

3 64 事件期間的坦克人是否為特別工作人員？

Nancy P. Pelosi 是否知道？

■ 俞劍鴻

研究札記

7 萬曆朝的制衡不足與努爾哈赤的崛起：

以新古典現實主義變項解釋

■ 胡貫廷

16 消失的聲音—叛離或抗議：

分析戒嚴時期臺灣與現階段中國之回應民意模式

■ 宋品岳

美中相關議題對話與後續發展觀察

吳崇涵 / 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

- 美中防長會談強調雙方需保持暢通的溝通管道；美認為臺海航行自由是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中方對臺灣海峽與南海採取洋洋封閉論政策，雙方立場分歧。
- 美中競爭關係日趨複雜，雙方能否維持對話管道，降低敵意與潛在衝突機率，端看拜登對習近平所提倡之「共識性護欄」是否能得到維持；拜習會面或可緩解美中緊張關係。

一、前言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今年 5 月底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對中政策演說，確立拜登政府的目標是圍繞北京「塑造戰略環境」，以約束中國對美國在二戰後所建立之「自由國際秩序」日益俱增的威脅行為。而達成此目標的方法或手段則是透過對中戰略框架的三大支柱：投資、結盟及競爭。投資指的是美國將對其國內的民主、競爭力與創新進行投資；結盟指的是華盛頓除將鞏固其傳統在亞洲的「軸幅體系」(hub-and-spoke system) 與北約 (NATO) 盟邦關係外，亦特別著重深化其他在亞太地區的合作夥伴關係，以追求共同的目標。而競爭指出拜登政府將基於前兩項措施，與北京競爭，以維護美國的利益與推進華盛頓所建立的一個具開放和包容的國際體系願景。

此次由布林肯所公布的中國政策，基本上符合各界對於拜登政府上任前的預期。早在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拜登曾在美國《外交事務》撰文說明復興美國民主與實力，與重建盟友關係為前兩大支柱。而拜登對中的第三支柱

「競爭」也符合其國安團隊所提倡之美中應維持「沒有災難的競爭」關係。本文將就美中相關議題的競爭與後續發展，分析如下。

二、拜登對臺軍事承諾與中共反應

拜登於今年 5 月 20-24 日展開上任後首場亞洲行，先後訪問南韓與日本。拜登在日本接受媒體提問時，再次提及臺海安全。即如果北京武力犯臺，美國將會採取軍事介入。《紐約時報》認為，拜登的言論摒棄傳統上美國總統偏好的對臺「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與其持相反意見的美國《外交政策》則表示，拜登多次的口頭言論並不代表華盛頓的對臺政策將有重大改變。

不過，美行政部門對拜登言論立刻進行澄清，強調拜登重申「一中政策」，且美國對臺政策沒有改變。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與國臺辦發言人朱鳳蓮隨即譴責拜登政府，強調臺灣問題屬於國內事務且沒有妥協與讓步的空間，奉勸美國不要繼續打臺灣牌。在對臺軍售議題方面，中共國防部長魏鳳和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Lloyd Austin) 在 2022 年「香格里拉對話」前首次會面，進行將近一小時的雙邊閉門會談。儘管魏鳳和在臺灣問題上態度強硬，會談中還是展現和緩雙邊緊繩關係態勢。奧斯汀重申拜登政府的對臺政策沒有改變，而魏鳳和則強調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現狀不能被改變。並提及雙方能面對面對談有助於管控危機發生與升級。美中國防部長更強調雙方需保持暢通的溝通管道，以阻止危機發生。

三、美中對於臺灣海峽的立場分歧

在 2022 年「香格里拉對話」結束後，中共外交部在例行記者會上回覆彭博社記者提問時表示，北京對臺灣海峽享有「主權、主權權利和管轄權」，聲稱在國際海洋法上無「國際水域」這個名詞，並提出所謂臺灣海峽為「內海」。我國外交部於 6 月 14 日反擊北京之說法，宣稱臺灣海峽為國際水域，屬中華民國領海範圍以外之水域均適用國際法上的「公海自由」原則。而美國國務院（U. S. Department of State）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在回覆路透社信件中，亦支持臺灣海峽是國際水域的說法，並指出這代表臺灣海峽屬公海自由的區域，其他國家具有航行與飛越之自由，受國際法保障。

對於臺灣海峽的法律地位，大致上可歸納為以下三點。首先，目前未有相應的國際法能作為中國聲稱臺灣海峽為其管轄範圍之依據。其次，雖然 1982 年《國際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中關於公海的法律定義，的確能證明臺灣海峽內沒有公海。但根據《公約》第 58 條，所有國家在《公約》內相關規定的限制下，在專屬經濟區享有《公約》第 87 條所指的航行或飛越的自由。換句話說，臺灣有其專屬經濟區，因此世界各國船隻享有航行自由。第三，過去英國、法國、加拿大、澳洲等軍艦都曾穿越過臺灣海峽，中國並未指控這些國家違反國際海洋法。這次專門批評美國穿越臺灣海峽行為，主要還是強調臺灣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是此，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已清楚表明，拜登政府將「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任何地方飛行、航行和執行任務，包括通過臺灣海峽」。

美中兩大強權對於航行自由權仍保有截然不同的觀念。美方從擁護海洋自由論的觀點出發，認為臺灣海峽航行自由是「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而對於北京來說，雖然其也在世界各地的公海進行航行，但對臺灣海峽與南海

方面，採取海洋封閉論的政策。

四、臺美貿易進展與北京反應

拜登在其上任後的首次亞洲行拜訪了韓國與日本，並在東京正式提出「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雖然臺灣未被納入此多邊機制，但拜登團隊則是透過雙邊機制與我國達成「臺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U. S. - 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Century Trade)。此倡議主要包括 11 項被美國所關注的經貿議題，例如貿易便捷化、國營企業、反貪污、勞工保護、氣候變遷、農業、數位貿易等。臺美雙方在今年就此 11 項議題進行談判，為將來臺美間的雙邊貿易協定進行鋪路。

臺美貿易間的突破再次遭遇北京強烈抗議。中共外交部與商務部皆發表聲明強調「臺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之簽署具有官方性質與主權意涵，已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然而美國「一中政策」中的主要文件，即《臺灣關係法》與三個聯合公報，已透露美國在與臺灣斷交後仍將維持經貿上之關係。北京方面，針對臺美緊密經貿合作也做出相對應反制，包括近來對臺灣出口至中國的石斑魚禁令，以及驗出臺灣出口芒果帶有新冠病毒。一連串的貿易制裁似乎是針對臺美緊密經貿連結而來。

五、結語

美中競爭關係日趨複雜，雙方亦逐漸朝向更深層的競爭態勢邁進。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於最新一次高峰會中，首次將北京視為「系統性挑戰」，並認定中國試圖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有鑑於此，兩大強權間是否能維持對話管道暢通，並降低雙方的敵意與潛在衝突機率，端看拜登對習近平所提倡之「共識性護欄」(commonsense guardrails) 是否能得到維持。若兩大領導人在不久的將來能當面對談，對美中日趨惡化之關係或許能帶來稍許緩解。

64 事件期間的坦克人是否為特別工作人員？

Nancy P. Pelosi 是否知道？

In June 1989, was the Tank Man Working for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oes Nancy P. Pelosi Know That?

俞劍鴻

一個退而不休的特別聘任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博士、前國立中山大學教授暨兼任所長（高雄市）

1989年5月，中國共產黨宣佈了戒嚴。6月初的前後，這個執政黨也動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坦克車和裝甲車。緊接著，國際媒體也拍攝到了天安門廣場的混亂、血腥畫面。

6月5日，北京市故宮以南的東長安街上出現了一幕馬上被吸入眼簾的畫面：被西方媒體稱為坦克人 / the tank man 的一個隻身大陸年輕人差不多以一分鐘的時間阻擋了一列18輛坦克車的前進。第一輛的解放軍車長還閃躲了一下、無意要碾壓過這一位手無寸鐵、作為歹徒或者非歹徒的年輕人。

33年之後的6月，筆者首次從一位海外華人博士得知於2016年4月《89民運史 / The History of the 1989 Democracy Movement》出版了。此一修訂版大幅度地完善了1996年6月的初版。曾經在大陸的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工作的作者陳小雅在這一本專書所研究和判斷的結果是：這個坦克人可能是解放軍的特別工作人員。

今年8月，坦克人又被提起。當時，美國眾議院長Nancy P. Pelosi在訪問臺灣地區。她對中國內地的年輕人已經不認得33年前的那一個著名坦克人的照片感到灰心。¹ 1991年9月，她刻意地去了天安門廣場並且展示了一面旗幟，以紀念身亡的64示威者。

很多言論和行動是會重複的

筆者在最近五年大量地觀看了內地有關中國國民黨、中共以及小日本之間的諜報記錄片、電影和電視影劇。

我的幾個讀者提醒我說上述的作品是在為中共作宣傳，要不然只有殺時間的價值。我回應說自古以來就有情報人員，他們的很多言論和行動是會重複的。在《誓言無聲 / 團捕間諜 / Shi Yan Yong Heng》² 的第8集的第27分鐘和第34分鐘，有一句敵對間諜所都同意的話值得我們記住：「往往無法證實的情報才是最重要的情報」和「有價值的情報一般都難以得到證實」。該劇情是在《反分裂法》出爐之前或者2002年8月播放的，³ 它「真實地反映了六十年代【初的一個冬天】我國

¹ <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208090011.aspx>, accessed on August 9, 2022.

² 此為反間諜劇的開山之作品。有人說《暗算》這部劇是諜戰劇真正的開山之作，之前的特務戲在這部劇之後統一進階為諜戲劇，柳雲龍也憑借本劇獲得「諜戰劇之父」的稱號。

³ 2位劇本創作者「查閱了大量相關資料，其中不乏國外解禁不久的機密文件，還採訪了解放戰爭中的地下情報人員。這些都為劇本中的人物和事件提供了支點，讓劇本專業而真實。」

隱蔽戰線尖銳複雜的鬥爭，深刻地表現了反間諜戰線的英雄們複雜真實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經歷。」⁴

不少的當代作品的確是真實故事的改編和具有值得關心和注意的情境畫面，比如電影《羊城暗哨 / Secret Post in Canton》；<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6Nz3FaqGW0>的第 20 分鐘（觀看《台灣演義》特務風雲，2013.12.22）；和《明椿暗哨》的第 24 集的第 24 分鐘）。

也有一些臺詞和另外一些臺詞是矛盾的。在《誓言無聲 / 圍捕間諜》的第 4 集的第 1 分鐘，吾人聽到以下的臺詞：其實間諜也好，反間諜也好，基本上不可能和電影裏那樣，又是槍又是砲，那麼驚險刺激，實際上，我們都是在閱讀檔案【以便找出好比說某一個諜報人員的代號】。可是，在同一集的第 8 分鐘和第 29 分鐘，觀眾又分別地聽到一些成為矛盾的臺詞：(1) 在 1960 年代初期還是有潛伏在北京市搞破壞和弄一點小軍事行動的臺灣地區情報人員；(2) 和臺灣方面要在北京市於春節期間搞爆炸。

沒有機會閱讀一手資料的研究人員像是我要學會取捨。必須要說的是，很多的官方資料也是具有爭議的，不見得可靠。這就是研究社會科學的無奈之處。

1988 年 9 月，張榮豐加入了當時擔任總統李登輝的國家安全團隊。今年 7 月，他指出說從事國家安全的工作必需要有幾個特質，包括：第一，正直的人格；第二，嚴謹的邏輯；第三，豐富的實務經驗；和第四，要有國際及對手的人脈。他也提醒大家說國安工作要做好，必須具備這些特質結合的大智慧，而不是施展一些陰謀詭計和耍一些小聰明就能夠完成。

其實，特工要具備其它的特質和懂得一些立即能夠要別人的招數，譬如第五，「做情報工作就要具備常人所不具備的極強洞察力」（觀看《獵敵戰將 / Hunt Enemy Generals》的第 24 集的第 7 分鐘）；第六，演（足一個）（配合）戲（觀看《羊城暗哨》的第 89 分鐘）；第七，避免觸動良心，因為行動失敗或者死亡的可能性會增加；猶豫會帶來危險以及背叛的後果是最致命的（觀看《螳螂 / The Mantis Killer》的第 23 集的第 13~14 分鐘）；第八，懂得何時演雙簧 / 唱黑白臉（觀看《內線 / Undercover》的第 1 集的第 36 分鐘）；第九，敢拿著手槍指著自己人 / 敢拿著槍對著對方的額頭（觀看《特種兵之深入敵後 / Special Soldier Behind Enemy Lines》的第 44 集的第 21~22 分鐘和第 24 分鐘）；第十，防範洩密 / 內部的人走漏風聲；第十一，做個局設個計（觀看《獵敵戰將》的第 32 集的第 10~11 分鐘）；第十二，不公布誰死掉了（觀看《最強諜報官 / The Strongest Spy Officer》的第 26 集的第 18 分鐘）；第十三，接觸對方，要先看是否得到上級的首肯（觀看《獵敵戰將》的第 9 集的第 18~19 分鐘）；第十四，迷惑對手（觀看《密令 1949/Secret Mission 1949》的第 21 集的第 24 分鐘）；和第十五，吊胃口 / tantalize/keep somebody in suspense，玩真真假假的遊戲（觀看《誓言無聲 / 圍捕間諜》的第 15 集的第 1 分鐘）。

逐步地檢驗那一位坦克人

第一，筆者並沒有一手資料來證明那一個坦克人是否正直。我只能夠憑直覺說由於尚未退休，他可能還是在軍中工作。服從上級命令和紀律的他，是不會輕易的對外講出真相的。中共中央的政策是在公開場合不再談被定調為「反革命動亂」的 64 事件，而私底下則會繼續進行安撫的工作。

如果坦克人是一個普通平民百姓的話，他早就向全世界公佈了，沒有必要譬如再等個 7 年到第 40 週年。

⁴ 高明飾演徐子風，他等同於汪精衛，因為前者一點秘密也沒有洩露，就是連家人都不說。

第二，阻擋一列坦克車的前進是不需要嚴謹的邏輯，只要冷靜、沈著就不會擔心被戰車輾壓過。一般而言，年輕的職業軍人是不怕死的。

第一輛坦克車長的邏輯很簡單：執行長官的指示和命令，要不然的話再以無線電話先請示上級才再行動。

第三，那一個坦克人很年輕，肯定沒有豐富的實務經驗。可是，見識廣的長官肯定會想到國外的一些案例或者點子來要求那個坦克人如何在 1989 年 6 月 5 日跳出來配合那一列坦克車。舉例而言，1968 年 8 月，蘇聯和另外三個東歐國家聯手攻打了捷克。一個年輕的捷克人挺身而出、阻擋了一輛俄國紅軍的坦克車。⁵

第四，那個坦克人肯定欠缺國際人脈，例如不會講流利的英語也不認識任何一個外國記者。至於 6 月 5 日，坐在坦克中的對手，其實都是在解放軍工作的自己人。

第五，坦克人的上司一定具有洞察力。後者挑選了前者不是沒有道理的。說不一定劇本還有備胎，亦即要第二個坦克人等待命令，萬一第一個突然無法抵達現場來參與表演。

第六，為了演足 6 月 5 日的戲，一名騎單車的男子和幾名身穿藍色制服的人帶離了坦克人。說不一定這一些穿著便衣的人員也是特工，就這樣子，一個假像浮出檯面可以被事後用來證明說解放軍還是把他們人民子弟放在第一位也沒有傷害到他們。其實，不少的街頭很混亂，解放軍有時候無法馬上分辨出誰是暴民、誰是老百姓。

當時，全球有數百個報紙和雜誌報導了 64 事件。那一些媒體工作者是否有倒回攝影機的帶子以確認那個坦克人是否也出現在 6 月 5 日之前的示威人群當中，以便判斷那一位坦克人是否被解放軍要求扮演一個臥底的角色，以利當有一天有必要時進行宣傳工作呢？⁶

第七，如果過了幾十年，理想、信念、紀律、使命和親情、愛情與友情發生碰撞，（動了私人感情的）那一位坦克人會是怎樣呢？良心的譴責、猶豫和背叛都不能夠被排除掉。至今，我們尚未聽到他的真正下落。

第八，演雙簧 / 唱黑白臉是有必要的。64 事件帶給大陸的執政黨極為不利的形象。解放軍的第一輛坦克並沒有轟掉那一個坦克人的這個事實可以淡化那一個衝擊。1989 年 7 月，八一電影製片廠出品的總政治部新聞紀錄片《飄揚，共和國的旗幟》也播放了阻擋坦克車的難得相關影像（觀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dJPhjMgrQA> 的第 6 分鐘）並且表示說「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看出，如果我們的鐵騎繼續前進，這個螳臂擋車的歹徒，⁷ 難道能夠阻擋得了嗎？攝像機拍下的畫面同西方某些國家的宣傳恰恰說明了【解放軍】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

第九，敢拿著手槍指著自己人 / 敢拿著槍對著對方的額頭等同於第一輛坦克車的大砲瞄準了那一個坦克人，那怕只是幾秒鐘。

第十，作為特工的坦克人沒有洩密，因為至今無人（含被外國媒體採訪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揭開謎底。

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2jzmmVfmU8> 的第4分鐘。

⁶ 毛人鳳下了很大的功夫隱藏了一個保密局的間諜在北京市的一個研究潛水艇的單位。前者還故意放出風聲說後者已經在解放前過世了。觀看《誓言無聲 / 圍捕間諜》的第18集的29~30分鐘。

⁷ 一個來自臺灣地區的敵對特務在北京市機場的一個學習表彰大會被封為（衝進）火海英雄。觀看《誓言無聲 / 圍捕間諜》的第17集的第6分鐘。

第十一，做個局設個計有其必要。當時，中共領導人肯定要考慮到繼續使用武力的後果。畢竟，解放軍是面對外國侵略者的也同時要強化它和人民的子弟兵之間的傳統關係。

第十二，就某一個個案，中共於 1950 年 3 月之後不再公布誰死掉了（觀看《最強諜報官》的第 26 集的第 18 分鐘）。那一個坦克人的處境為何？是死、是活？

第十三，解放軍的特工肯定要配合組織的要求。那個坦克人也不例外，因為有足夠的時間規劃 6 月 5 日的那一幕。

第十四，迷惑對手是每一個諜報單位要做的事，例如 1950 年 6 月，當韓戰爆發之後，大陸的公安局的也要繼續迷惑躲在暗處的保密局（觀看《江城令 / River City Order》的第 16 集的第 6 分鐘】。6 月 5 日的那一幕就是在轉移視線。

第十五，一位經驗豐富的導演肯定懂得如何吊觀眾的胃口。同樣的道理，每逢週年的前夕，很多人會猜測到底那一位坦克人是否會現身。如果一代是 20 年的話，2029 年就是 64 事件的第 40 週年。屆時，那個坦克人也只不過是 60 歲上下。在《誓言無聲 / 圍捕間諜》的第 1 集的第 4 分鐘，觀眾看到的是於 1960 年代初期的一個冬天，一個剛得到一枚新勳章、年紀剛滿 60 歲的老副局長被總部黨組織集體要求退休。今天，坦克人也許可以做到 65 歲。至今，部長級官員的任用和免去職務，仍然是嚴格執行 65 歲就得退休。

Pelosi 已經意識到說很多的現在的內地年輕人覺得 64 事件和他們的切身利益無關了。到了 60 週年的 2049 年，坦克人面對那 18 輛坦克的那一和平收場的戲是否會變成了主流觀點呢？

結論

我的解讀是：被陳研判為似乎是特工的坦克人，這一種可能性是不能夠被排除掉的，因為坦克人具有很多和平民並不一樣的特工特質和懂得一些立即能夠要別人的招數。下一個問題就來了：如果坦克人被確認為特工而非歹徒的話，Pelosi 是否還會繼續凸顯他的神勇？



徵稿啟事

本通訊歡迎關於中國大陸研究及教學方面的稿件。包括課程設計、教學心得、研究札記、各單位的活動簡訊、新教材或研究資料的引介、正在進行的研究計劃、及時問題討論等與中國大陸教學研究相關的課題。文長以三千字左右為宜，不須註解，並書明投稿人姓名、工作單位、職稱、聯絡地址與電話。來稿請寄 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或傳真至 02-2365-3433，或將電子檔案傳送至 politics@ntu.edu.tw「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編輯委員會」收。

讀者來信

本欄歡迎讀者來信，就有關大陸研究與教學發表意見、評論，或分享體驗。我們希望通過本欄為這方面的交流開闢一些空間，故不考慮人身攻擊或不帶反省性質的情感發洩。來信請提供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編輯保留選稿及剪裁的權利。來信請寄 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編輯委員會」收。

萬曆朝的制衡不足與努爾哈赤的崛起

以新古典現實主義變項解釋

胡貫廷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摘要

明末萬曆朝時期，努爾哈赤在東北明朝管轄地域內不斷發展勢力，逐步兼併女真諸部、建立統治根據地。為何負責東北軍政之官員及萬曆朝中央在努爾哈赤勢力發展過程中即已陸續掌握以上資訊，明廷卻從未對其開展足夠深入且具持續性的制衡作為，導致努爾哈赤在萬曆朝末年發動對明的進攻，最終得以建立清朝？本文試以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 Randall Schweller 所提出、四個可能導致對外制衡不足之國內變項，套用至此個案中，嘗試理解四變項在萬曆中後期情形，並探討這些變項是否影響明廷針對努爾哈赤採取的策略，導致後者能崛起，同時也能希望探索理論在中國古代案例的適用性。研究發現在選定年代內，社會團結程度、菁英共識程度及菁英團結程度等三變項皆高度符合、政府穩定程度亦中度符合 Schweller 理論中可能造成對外制衡不足的情形，故對於明廷未對努爾哈赤採取積極措施的策略，提供相當充足的解釋力。

關鍵字：明末、萬曆、努爾哈赤、新古典現實主義、制衡不足

壹、前言

自西元 1583 年（萬曆十一年）2 月，努爾哈赤的祖父覺昌安與父親塔克世，在遼東總兵李成梁二次發動對古勒寨之攻擊中遭亂軍誤殺而亡、種下努爾哈赤對明之恨意始，努爾哈赤及其部眾在接下來漫長的六十一年歲月中，分階段依序審度當下形勢、掌握明廷思維以及歷史機遇，在與明廷的眼皮底下與其長期互動，終於取得東北乃至整個中國本部。努爾哈赤由報家仇這個具十足合理性的出兵動機開始一系列征伐，也把握明對他的補償心理，獲得敕書三十道、馬三十匹並承襲父祖之建州左衛都指揮使職位。而後他便在明廷不斷地賜予他更多頭銜的過程中爭取在女真部落中的影響力與控制力，也藉由朝貢等作為降低明廷對自身不斷在東北擴大影響力的警覺心。努爾哈赤在 1587 年（萬曆十五年）9 月，在大致統一建州本部後，於虎攔哈達（hūlan hada）建佛阿拉城（fe ala）。自此他的封號越來越高，從「女直國聰睿貝勒」（sure beile）發展至「女直國建州衛管束夷人之主」、再到「建州等處地方國王」、再到喀爾喀蒙古五部使節上尊號「崑都倫汗」（kundulen han）⁸，儼然有稱王之勢，明廷中卻未形成普遍警覺，也未採取足夠的制衡作為。後續努爾哈赤陸續統一女真諸部過程中，明廷中的警訊慢慢增加，明方也陸續採取了一些小規模應

⁸ 即「恭敬汗」之意。

對措施，但似乎都不足以真正阻止女真成為過度強大的地區力量。努爾哈赤的力量一直持續發展到其發布對明「七大恨」後，於萬曆朝⁹末年之 1618 年（萬曆四十六年）4 月 14 日出兵計襲撫順¹⁰取得大勝後，明廷才整體一致地意識到對方帶來的威脅並做出力量足夠的回應。

在此漫長的時間與諸多的互動機會中，明廷為何沒有及早制衡努爾哈赤的崛起與壯大而顯得如此後知後覺？在張居正掌權的嘉靖朝至萬曆朝初年，明朝的邊防狀況相當穩定，遼東總兵也有定期制衡崛起部族的作為，為何自萬曆朝中晚期至 1618 年撫清之戰間卻有如此轉變？又我們可以從明史中得知努爾哈赤崛起的年代當中，明朝內政問題叢生、鬥爭不斷，那 Randall Schweller 提出的新古典現實主義途徑是否可以引領我們去思考萬曆朝中晚期是否有某些國家內部的變項導致明對外出現制衡不足的情形？本研究希望從 Schweller 的四個變項出發，以查找晚明及清初史相關研究文獻為研究途徑，檢視明朝內部各變項的境況及明與努爾哈赤之互動演變過程，藉以觀察明廷是否因此對外制衡不足；也希望能在過程中進一步探索 Schweller 之理論對此一案例，乃至於中國歷史的適用性。

貳、文獻回顧與理論梳理

本研究使用的理論架構來自 Randall L. Schweller 的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一文（2004）。以下摘述此篇文獻的重要論點並整理其理論架構及分析變項。

一、重要論點

- 過去權力平衡過度強調體系對單元的制約，較忽略單元的能動性，且認為國家對外部「危險的相對權力變化」都能以即時、系統性的方式回應。Schweller 則主張必須重新審視單元的能動性及單元採取行動可能出現不一致現象，以彌補以往被忽略的「結構性因素會先被放入菁英圈內外做綜合考量」後，才會做出最終決策的這段過程。
- 國內政治扮演的角色像是一條回應外部力量時傳輸、中介或導航的傳送帶（transmission belt），且在是否制衡的問題上，甚至扮演比結構性因素還關鍵的角色。
- 在菁英與社會層面一致而能作為單一行為者的國家，越能符合現實主義的預測；而在菁英與社會等層面越分裂的國家，則越有可能制衡不足（under-balance），即(1) 國家未選擇制衡策略，改採扈從、推卸責任、綏靖、毫無作為（inaction）、保持距離（distancing）、躲避（hiding）、等待（waiting）等策略；(2) 國家選擇制衡卻只做半套（adopted ineffective half measures）。

二、理論架構及分析變項

Schweller 主張制衡不足出現的原因細分為能力（state's ability to extract resources）及意願（state's willingness）兩部分，其下再各有兩變項，共四變項。

⁹ 萬曆朝始於西元 1573 年，終於 1620 年。

¹⁰ 史稱撫清之戰。

(一) 能力

1. Government / regime vulnerability 政府穩定程度
 - (1) 變項核心內涵：「現任政權被移除的機率」
 - (2) Schweller 提出五項子指標：(a) 政府權威是否透過強制力形塑；(b) 人民的期待是否被滿足；(c) 是否有大眾的廣泛支持；(d) 政策過程中是否能將國內干擾極小化；(e) 是否存在反對團體
2. Social cohesion / fragmentation 社會團結程度
 - (1) 變項核心內涵：「社會是否普遍接受現有建制」
 - (2) Schweller 綜合 Lewis Coser 之論提出以下子指標：
 - a. 正面表述：社會心理上被整合並互聯於網絡之中的程度、政權是否值得保衛存續、若選擇團結以制衡威脅的戰勝機率、是否社會整體皆感受到威脅等
 - b. 反面表述：有多少人質疑正當性或甚至想推翻這套規則
3. 在能力方面，雖 Schweller 強調自己提出的四變項分析具備跨時空解釋力，但從此分析的建構方式和挑選的支持案例仍看得出這套分析仍奠基並受限於西方近兩三百年的發展。在當代威權國家乃至於古代帝國如明，政府穩定程度與社會團結程度在理論上雖一定預先存在，但(1)資料的可取得性；(2)呈現樣貌的真實性；(3)對菁英決策的實質影響力都會有很大的變異空間。以此三點分析社會團結程度時，可能衍伸出(1)古代通常缺乏系統性的民意採樣，也沒有足夠的大眾傳播途徑能將部分至全體民意反應出來；(2)就算呈現出來可能也是經過官僚系統依循個人或集體利益層層詮釋、轉譯下才留在歷史紀錄中；(3)另，在中國未掀起民族主義思想前，多數人民對國家的認同與歸屬存在不少值得探討的面相——對國家建制的認同感是否存在？若存在，是否僅限於士人階級而排除他者？此存在是基於無論政權為何皆須無條件忠君愛國的狹義儒家倫理？還是基於某些政權之核心論述與理性判斷而形塑？在政府穩定程度變項上也有與上述相似的問題，甚至因繫於政權存亡而被更深地調整。以上特點導致實務上，幾乎只能觀察較能被測量的「民變」等事件，待事發後才回溯推斷此二變項。

進一步看，此二變項「對政府有影響力」是 Schweller 的隱藏預設，但值得我們觀察的是在缺乏民主機制、強調上下倫理又進行垂直管理的明代，此二變項是否真的重要？

(二) 意願

1. Elite consensus / disagreement 菁英共識程度
 - (1) 變項核心內涵：對於是否正面臨外來威脅、其本質及威脅程度為何、要用哪一個方法解決。¹¹
 - (2) 輔助變項：資訊多寡與清晰度。資訊越多越清晰則菁英形成共識機率越高。
2. Elite cohesion / Fragmentation 菁英團結程度
 - (1) 變項核心內涵：「中央政府領導力是否被各式內部不一致所分化」

¹¹ 此指標之操作性定義即「對於選項的個別政治風險與成本接受度是否相同」。

-
- (2) Schweller 提出以下子指標：派系間是否有妥協空間？菁英對國內的權力競逐狀況？是否有機會主義者考慮通敵以提高自身權力？對外部多個威脅的排序？應與誰結盟？有限軍事資源該用在邊疆還是國內？
3. 在意願方面，有一項問題。首先在運用此理論到此案例時，必須思考對於菁英的認定為何——僅有皇帝與閣臣、皇帝與所有京官抑或是皇帝及所有京官及在女真議題上呼風喚雨的遼東總兵及其軍事集團？若採狹義認定則無法準確再現此議題上有影響力的菁英，若廣義認定也恐牽連過廣。為聚焦觀察，本研究中將採狹義認定，以皇帝及所有京官為基礎，輔以對東北軍事集團影響力的整理與說明。

三、研究範圍

在宏觀評述晚明局勢的發展及明朝的敗亡時，多數觀點都同意萬曆朝中晚期是明朝轉衰，再無法尋求中興的關鍵，如「明朝國勢，大墮於天啓，致亡於崇禎，而禍端實起於萬曆」（繆振鵬，2008），可知萬曆朝在明中後期扮演關鍵轉捩的角色。除此朝對明整體的影響外，「萬曆朝相對較長」及「恰好與努爾哈赤崛起時期大致相符」為選擇此時間段的原因。以前者而言，由同位皇帝長期執政能塑造相對較單一、同質且利於觀察內部發展與決策行為的環境；以後者言，努爾哈赤開始征伐乃至軍事挑戰皆落在此範圍內，因此較適宜。

又史家多將萬曆朝區分為前期的中興與中後期的中衰兩部分。萬曆前期¹²為張居正在世且掌握首輔之位的時期，考成法與一條鞭法皆在此階段提出，頗有中興之象；張居正逝後至萬曆末年，則有黨爭、國本問題、內閣六部言官之間互相攻訐、神宗怠政、礦稅之弊等諸多內政問題。Schweller 所強調的國內制約因素及努爾哈赤崛起皆發生在此朝中晚期，因此僅擷取中晚期作為觀察範圍。

Schweller 在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中曾提到制衡 (balancing) 要求的是一個「國家並未直接籠罩於侵略性國家 (predatory state) 的危害之下，卻仍出於長期利益而決定予以制衡」的景況 (1994:135)。Jack S. Levy 也曾提到「若侵略者 (aggressor) 已發起直接軍事行動將潛在制衡國置於戰爭威脅下，即不屬於制衡 (balancing)」(2003 : 135)。因此，若欲適用 Schweller 新古典現實分析架構於此案例以觀察明之制衡情形，則我們必須排除所有「明朝已遭後金軍事挑戰」的情形，因此觀察範圍的終止點將設定在後金首次直接軍事挑戰明朝的「1618 年（萬曆四十六年）撫清之戰」。綜上，本研究設定之時間範圍為萬曆中晚期肇始之西元 1583 至 1618 年。

參、研究成果

以下將以文獻所蒐集之資料，並以文獻回顧中各指標之意涵及其子指標，試歸納四種變項的情況各自為何。

一、能力方面

在此將先分析影響明廷能力的兩個變項，上述曾提及此二變項之問題將造成此部分資料較少

¹² 指萬曆元年至十年，即西元1573至1582年，首輔張居正於1582年7月9日逝世。

或有不能反映真實的問題，但仍將嘗試以上述變項及其子指標之相關資料進行分析。

(一) **Government / regime vulnerability 政府穩定程度**

以明廷本身來說，其政權存在已有兩百餘年，曾經足以動搖國本的靖難之變也已過去多時，因此不論是政權的創立神話、統治結構與官僚體系、長期塑造出對此政權之忠君愛國觀念、與政權存續利益綁定之各階級等等基礎都已邁入鞏固階段。當時體制內缺乏長期存在之明顯反對團體，即第五項子指標為「不存在反對團體」，亦即穩定程度高。有鑑於明帝國並不採民主，除正常的駕崩承繼與政變或革命推翻外亦無其他移除此政權的方法，也無系統性資料證明第三項子指標「是否有大眾廣泛支持」，且重大政策制定皆由中央主導，即第四項子指標「能將國內干擾極小化」，亦即穩定程度高。

但由第二項子指標「人民的期待是否被滿足」觀之，觀察時間段內仍有一些情形讓我們能觀察到政府已開始不能滿足大眾對帝國照顧其基本生存需求的期待。以疫疾處理為例，〈明代瘟疫與帝國的覆亡〉一文指出「明代是中國歷史上災疫最為嚴重的時期之一。但由於醫療資源不足、防範意識淡薄、疫病知識缺乏、救災制度僵化、政治腐敗等，災疫應對機制也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到萬曆中晚期，面對瘟疫的出現，政府的反應幾乎失靈，無法發揮應有之作用。」「萬曆中晚年，此時的明廷，不僅體恤民情的減稅不做。連有司報請，減低疫情的措施都置之不理。此種視民瘼於無物，完全無心治理朝政的荒唐行徑，一直迄於萬曆去世，明帝國國政幾乎處於空轉狀態」（劉振仁，2021）減稅、祈禳等措施屬於明朝歷代以來面對疫疾雖不甚有效，但傳統上會執行以體現愛萬民之心的政策，萬曆中晚期卻連表面工夫都不願意做，可以顯示出萬曆帝不願意處理百姓基本生存需求的態度。

統治這件事應該包含透過一個規範化的官僚體系去形塑並執行政策。然萬曆帝自 1586 年下半年因國本問題等諸多緣由開始怠政，其間出現「不上朝、不見大臣、不搞經筵日講、不參加祭祀大典」「臣下的軍政奏摺不及時處理，章奏多留中不下」等現象（張海英，2015），導致諸多官員因此不辭而別而又未甄補，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開始大量缺乏，「時兩京缺尙書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按監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聶作平，2011），行政機能時常癱瘓，顯然無法滿足人民期待，亦難獲廣泛支持。

綜上，觀察時間段內，以可觀測指標而言，實質上符合 Schweller 所稱之「現任政權被移除機率低」，即政府穩定程度相對較高，但仍潛藏著人民的期待不被滿足、未獲廣泛支持的隱憂。

(二) **Social cohesion / fragmentation 社會團結程度**

因萬曆朝期間難以上述各正面表述子指標進行準確評估，故以負面的「是否多數人質疑社會規則正當性或甚至欲推翻之」的民變作為觀測社會團結程度的指標。張居正掌權期間將經濟與賦稅制度沉疴去除，連帶使民變減少，而資本主義重新開始蓬勃發展，由張居正掌權的萬曆前期也未有民變發生，萬曆中晚期內卻足足發生四十五起民變（商傳，2014）。

民變發生的其中一大主因來自神宗向各地派遣礦監稅吏，史稱礦稅之弊。萬曆帝嗜好聚積財貨的個性在財政制度上受到極大約束，因透過政府正常渠道開闢財源須受戶部、工部控制，於是親自委派太監作為礦監、稅吏至全國各地直接收取稅負作為宮廷收入。自 1592 年礦稅大興開始，太監中飽私囊、多重徵稅情形嚴重，勞民傷財且實際所得有限。礦監、稅吏為向上繳納足額，只

好責令地方官吏納銀，間接向人民敲詐勒索。稅負造成各地飢荒、出現大量流民，更激起各地多起民變，如反對徵稅太監潘相的江西民變、反對礦稅太監高淮的遼東民變等。礦稅之弊不僅將重創略有成果的資本主義發展、打擊人民生計，更因礦監、稅吏四處凌駕地方官僚職權或逼迫其配合，造成社會內部撕裂，也造成中央與地方官僚的撕裂。在此情況下，社會團結程度相當低落，金融與社會資本被如此破壞下也更難以達成 Schweller 所指出社會團結程度的目的——汲取社會資源以進行制衡。

二、意願方面

(一) Elite consensus / disagreement 菁英共識程度

此變項是 Schweller 認為最必要也是最關鍵的變項，恰好在相關文獻中，也是資料與論述最豐富的部分。首先從文獻中可以發現，明廷長期對努爾哈赤一系採不作爲或綏靖，而非制衡。明廷長期爲其加官晉爵，忽略相關警訊，甚至到 1615 年，即後金國建立的前一年，薊遼總督還向朝廷奏稱其「唯命是從」(閻崇年，2007)。以下爲數個可能的菁英共識面向：

1. 本無制衡共識

Schweller 主張若制衡欲成功，必須在菁英群中堅定、多數、廣泛地倒向制衡，否則其他選項經常因成本較小而勝出。當時的明廷即未有足夠堅定多數的制衡共識，因(1)努爾哈赤成功向明廷塑造和平崛起形象。他利用「退地、鑄盟、減夷、修貢」賺取信任；以斬首劫掠明之部族頭人並上獻；在 1590 至 1615 年間八度入北京進貢(閻崇年，1989)；在萬曆朝鮮之役期間兩度表示願發兵支援以塑造「只有恭順之心，別無二心」的形象令朝廷印象深刻等等作爲令自身形象深植菁英心中。(2)支持非制衡一方或主張努爾哈赤對明有幫助的聲量本身就較大。如薊遼總督張國彥、顧養謙曾表示努爾哈赤的強大對明朝有益，可以「因其勢，用其強，加以賞賚，假以名號，以夷制夷，則我不勞而封疆可無虞也。」另如閻崇年所述「明朝已步入萬曆中期，朝政腐敗，官將於邊事多懷有息事寧人之心，行事敷衍欺騙，所以既然努爾哈赤表現恭順，朝廷也樂意倚爲所用。」(2007)，加上努爾哈赤的恭順表現，更使非制衡派成爲隱然主流。偏向制衡政策的發言，如禮部侍郎楊道賓曾主張「分其枝、離其勢、互令爭長仇殺、以貽中國之安」的分而治之政策(南炳文、湯綱，2003)及反對李成梁養虎貽患的彈劾則不了了之。(3)以上不制衡與相信努爾哈赤忠心的想法形成菁英之間的自我強化。如萬曆二十七年間，努爾哈赤已侵擾多處，但當朝鮮向明守將探詢時，守將卻告知朝方努爾哈赤歲歲入貢之忠，表示「不大繫」且該地高山峻險將不利於胡虜擅長之騎射技術，因此無虞(閻崇年，2007)。

2. 資訊寡而不明

Schweller 提出資訊量的多寡與明確程度與形成菁英共識的機率爲正相關。在萬曆中晚期東北地區主要由長期擔任總兵、游擊等邊防要職之遼東武人李成梁家族掌控，對時局影響甚鉅。葉高樹在〈明清之際遼東的軍事家族—李、毛、祖三家的比較〉一文中對李成梁及其家族的活動與影響力作了詳細介紹(2009)。史家咸認李成梁是努爾哈赤崛起的關鍵。他「既未干涉努爾哈赤破壞建州女真秩序的行爲，又未制止他據地自雄的企圖」，又誤以爲努「能爲明朝所用又成不了氣候」因此只要努表忠，就積極協助其向朝廷保奏，甚至將營建多年的新疆六堡「棄地以餌之」。

在時局中如此重要的人物卻為明廷創造巨大的資訊障礙，進而使菁英共識更難以形成。李成梁在二度任遼東總兵時，多有「掩敗冒功」或在「有限捷報中誇大不實」的情形（葉高樹，2009），以爭取更多朝廷封賞作為培植家族勢力的資本。多年下來造成明廷對遼東的發展情況過度樂觀，創造出更大的資訊落差，使菁英共識更難形成。

另，朝鮮自努爾哈赤崛起後即密切注意其發展動向，不僅觀察到努的自封頭銜愈加崇隆，還帶領明朝官員前往佛阿拉城一觀努之軍容壯盛。以上來自朝鮮的警訊也未能準確傳達至明廷。

3. 對威脅的認知與排序

朝鮮陳奏使李恒福曾分析「我國（朝鮮）之所畏者老胡（指努爾哈赤），而中朝則以老胡為不足憂，其所甚怕者西韃子（蒙古）也」（繆振鵬，2008）。顯示出歷史遺產為明廷菁英所留下的是對蒙古的恐懼，該思維也具延續性，最終影響了菁英對威脅的認知。

綜上可知，由菁英對於「是否正面臨外來威脅」「威脅程度多高」「努爾哈赤作為威脅的順位」等認知產生分歧同時也對「是否制衡」意見分等子指標能看出菁英共識程度低落。另外以輔助變項而言，資訊稀缺且清晰度低更加劇共識的分崩離析。

（二）Elite cohesion / Fragmentation 菁英團結程度

朝政紛亂可說是萬曆中晚期的一大寫照，菁英團結程度比起歷任皇帝甚至歷代都算是相當低落。

1. 國本問題與怠政

神宗立幼廢長的希望遭到群臣的激烈反對，造成國本問題，加上本身好安逸享樂，於 1586 年開始怠政。神宗初期整肅張居正一事加上神宗本身獨斷且喜怒無常，造成張居正後續之輔臣多明哲保身或阿諛奉承之人，如「繼他主輔的申時行、王錫爵、許國之流，只知搬弄文墨、依違皇上，繼之以口舌紛爭」（繆振鵬，2008）。君王退居幕後無法即時仲裁爭端，時常將奏摺留中不發且常對大臣採取、規避、欺騙等手段，不僅讓閣部大臣開始遇事敷衍，更為朝中惡鬥創造更多空間。

2. 朝中惡鬥

萬曆後期「盡反居正所為，發展為廟堂水火、恩仇相結、百舉盡廢（繆振鵬，2008）。」是黨爭初期的寫照。張居正逝後，朝中陸續形成反張馮（即馮保）、反與張馮有任何牽連者而曾被張斥逐者皆復宦等風潮，再推展到所有新政皆被挑戰。此時復官者或報與居正之隙，或謀求高位，紛紛加入對張馮的追討中，揭開派系鬥爭的序幕。自此陸續衍生出閣臣與復出官僚之間、閣臣與吏部的京察之爭乃至後續由東林黨與宣昆齊楚浙等各黨的東林黨爭等等牽連愈廣、對立愈深的鬥爭，甚至有閣臣多年不視事的情況。再加上該段期間內爆發之妖書、巫咒、梃擊、楚王等宮廷大案，朝中烏煙瘴氣，各立門戶，國家大事缺乏討論而盡淪為意氣之爭。上述狀況以「派系之間是否有彌合妥協空間」光譜觀之，顯然落在毫無妥協空間之一端，也清楚顯示出菁英團結程度相當低落。

3. 李成梁的影響

Schweller 提到菁英對於個人權力利益的追求也會影響菁英團結程度。在邊防方面，李成梁個

人的利益追求也扮演相當大角色。李成梁晚年「貴極而驕，奢侈無度」且「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達官要人無不飽受他們的重賂，為之左右」，可以看出他累積龐大的資產，一方面用於保持家族高度戰鬥力；一方面則用於「疏通高官顯貴，以確保朝廷信任」，作為穩固家族政治地位的後援。李成梁最初以中央官員，尤其內閣大學士為結納對象，再以中央政治力干預地方的人事、行政，可稱之為中央型的軍事家族；然無論交際範圍如何廣闊，京官職位的異動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家族利益，故而在去職之後，另闢與能直達天聽的宦官相結合的途徑，獲得重掌權力的機會（葉高樹，2009）。遼東之經濟與政治利益由國家大事與公益轉化為李家追逐更高權力與安全感的籌碼，使其家族能久居高位並長期維繫在地影響力，同時也使努爾哈赤的崛起一再被忽視。對外事務由這樣特質的關鍵人物所掌控，對菁英團結程度自然也有負面影響。

綜上，萬曆帝本身的領導力確實被各式內部不一致所分化，符合菁英團結程度低的核心內涵。就子指標而言，我們可以觀察到派系妥協空間趨近於無，權力競逐狀況也異常激烈，也同時有關鍵軍政人物操弄當時情勢以謀取個人發展的情形發生，故可以判定菁英團結程度低落。

表一 四變項分析結果

變項名稱	分析結果
政府穩定程度	偏高，但仍存在因人民期待未被滿足、未獲大眾廣泛支持而使此程度下修之可能性
社會團結程度	低（以民變做為主要觀察基準）
菁英共識程度	低
菁英團結程度	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肆、結論

綜上分析可見，在能力方面，政府穩定程度偏高但存在向下修正的可能性，而社會穩定程度若依民變這項負面指標觀察應偏低。Schweller 指的能力為「動員資源以作為制衡之用」的能力，派遣礦使稅吏若作為該時期中實際由最高領導者直接進行的財稅方面的動員測試，則我們可以說不論是可供動員的資源，或動員能力本身，都是相當不足的。在意願方面，我們看到菁英不僅缺乏堅定而多數的制衡共識，更因資訊缺乏、關鍵人物失職、努爾哈赤成功營造形象而大幅倒向不制衡的一側；也能看到在當時的朝廷環境下，菁英們無法身免於鬥爭的風暴，團結空間也越來越小的狀況。在能力變項相對欠缺而意願變項極度欠缺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說 Schweller 對於制衡不足的解釋似乎可以應用於此個案作為解釋。

研究過程中也嘗試論述了 Schweller 的理論工具應用於此個案，乃至於其他中國古代個案時，可能需要適應與補足之處。以政府穩定程度而言——如何操作性地觀察政府形塑權威的強制程度？在缺乏和平轉移政權途徑（如選舉）的古代非民主體制中，如何蒐集人民的期待與支持度？以社會團結程度而言，應設法增進正面子指標的可操作性而不只被傳統的負面子指標「民變發生」所侷限，包含：對外威脅的資訊與感知是如何在古代資訊傳播情境中運作？以上兩個能力變項在決策與統治皆集中的古代，對菁英及最終決策的影響力有多少？是否連帶影響到其理論解釋力不如意願二變項？

最後在研究限制方面，新古典現實主義作為現實主義的修正，不可避免地必須接受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其中女真屬於名義上接受明朝統治，卻保有一定自主性與自治權力，也能追求擴大自身權力的地區，因而本案例不完全符合基本假設中的「國際政治屬於無政府狀態」，更像是有限的有政府狀態。若採嚴格定義，則努爾哈赤及其勢力最近似單一理性國家的時刻在於 1616 年（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城正式建國，建元年號「天命」，群臣尊努爾哈赤為「覆育列國英明汗」，從此稱明為「南朝」，正式與其分庭抗禮之時（閻崇年，2007）。但若觀察 1616 至 1618 僅僅兩年之間的明朝國內因素與對女真決策，很難完整描繪並理解其長期脈絡與現狀。退一步說，本學期各朝代與邊疆民族之多層次關係也很難以盡然符合西方現實主義理論的西發利亞體系想像，也因此必然出現西體中用上的侷限。因此本研究更像是將 Schweller 提出的架構作為檢視工具，同時將明與女真暫歸為可探討之國際關係，嘗試運用於案例中，而非驗證新古典現實主義整條支派是否與案例相符。

另囿於研究時長，本研究未能直接翻閱明朝歷史原典（《明史》、《明實錄》等），再從中整理菁英與社會情況及篩選出明廷對女真政策，而僅從明史相關研究，包含專書及論文中，篩選出篇幅佔比已然稀少之「對女真政策部分」。進行資料蒐集後，初步了解到萬曆朝對女真政策資料稀少的原因來自：(1) 在萬曆怠政下，奏章流通、君臣溝通流暢度與決策效率皆大幅下降；內政事務的數量與重要性又普遍大於對外之下，「對外政策形塑論辯過程」方面資料遠較「決策結果宣示與紀錄」少。(2) 女真的威脅在萬曆朝大多時間內是被低估的，且對北邊防的新資訊、進程、成效等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遼東在地軍事家族壟斷，經篩選過後的資訊才會傳到朝廷中。因此若後續有機會再深入研究，應再行以「明朝歷史原典」及「政策關鍵人物之個人傳記」為基底以俾能蒐集更多相關政策論辯資料。

參考資料

一、中文文獻

- 南炳文、湯綱，2003，《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商 傳，2014，《走近晚明》，北京：商務印書館。
張海英，2015，《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葉高樹，2009，〈明清之際遼東的軍事家族－李、毛、祖三家的比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2: 121-196。
劉振仁，2021，〈明代瘟疫與帝國的覆亡〉，《中國行政評論》，27(1): 77-106。
閻崇年，1989，〈努爾哈赤入京進貢考〉，閻崇年，《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頁 27-32。
閻崇年，2007，《努爾哈赤》，臺北：聯經。
繆振鵬，2008，《明朝三帝秘錄》，北京：作家出版社。
聶作平，2011，《帝國的黃昏：晚明的人與事》，臺北：靈活文化。

二、外文文獻

- Levy, J. S. 2003. "Balances and balancing: concepts, propositions, and research design." In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ed. Vasquez and Elman. Prentice Hall, 135.
- Schweller, R. 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1): 72-107.
- Schweller, R. L. 2004.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2): 159-201.

消失的聲音－叛離或抗議

分析戒嚴時期臺灣與現階段中國之回應民意模式

宋品岳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摘要

近年來中國不斷打壓民意，任何危害中共政權的言論皆被審查甚至刪除，造成學界主張中國會漸進式民主化的理論遭受挑戰。筆者發現若進行時空上的交疊，戒嚴時期的臺灣亦是在限制民意的框架之下。因此本文將透過學者 Hirschman 的「叛離－抗議－忠誠」理論建構賽局模型，從而解釋現階段中國政府與戒嚴時期臺灣國民黨政府對於民意的回應與控制模式。

本文發現，現階段習近平政府統治下的中國係透過勾勒多元性的藍圖，誘騙人民相信中國政治與社會的多元性，從而使人民與政府互動時，永遠都選擇忠誠；然而，戒嚴時期臺灣政府因遭逢內部與外部的壓力事件，人民在信心下降的同時，部分選擇叛離國家，部分選擇透過抗議反對政府，最終造成國民黨政府的崩潰，迎來臺灣的民主化進程。

一、威權政府之下的言論控制

言論自由對於人類而言，無疑是一項基本且不可被恣意剝奪之權利。誠如《世界人權宣言》第 19 條所揭載：

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根據學者 Juan J. Linz 的定義，威權政府係一有限無責任的政治多元，缺乏嚴密的思想指導體系及社會動員；領袖在為嚴格劃定但可明確預見的政治範圍內行使權力 (Linz, 1964)。¹³ 隨著科技與網路的發展，威權政府統治的面向也趨於多元。作為學界上分類的威權政府，對於中國目前處理民意的模式，學者 Ashutosh Bhagwat 提出中國係利用民意作為其政權合法性的基礎，試圖在地方政策上與中央進行切割，從而使政府作為「政策援助者」的角色能夠被凸顯，亦能夠使人民作為與地方政府的政策的異議者 (Bhagwat, 2015)。

學者 Lydia Khalil 在 Lowy 國際政策研究所針對新冠肺炎對於中國政體影響的報告指出，數位威權主義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使政府不僅可以透過管控、監視、鎮壓、審查以操縱人民，更擴大政府當局政治控制的幅度。威權政府透過數位、科技管控人民，就政治面向而言其足以提供人民一個看似多元、民主的社會外觀，從而滿足人民在訊息交流上的需求，同時亦讓政權增加

¹³ 原文為 “Political systems with limited, not responsible, political pluralism, without elaborate and guiding ideology, but with distinctive mentalities, without extensive nor intensiv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except at some points in their development, and in which a leader or occasionally a small group exercises power within formally ill-defined limits but actually quite predictable ones.” (Linz 1964)。

多個「觸手」深入人民的生活之中，藉此獲得更加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威權政府藉著數位科技，能夠更加快速的獲取民意，並給予高度的回應性（Khalil, 2020）。然而此種高度回應性並非係將民意納入政策規劃之過程中，而是政府當局為了避免人民因無立即獲得政府給予的回覆，漸漸累積成民怨，最終遭到人民的反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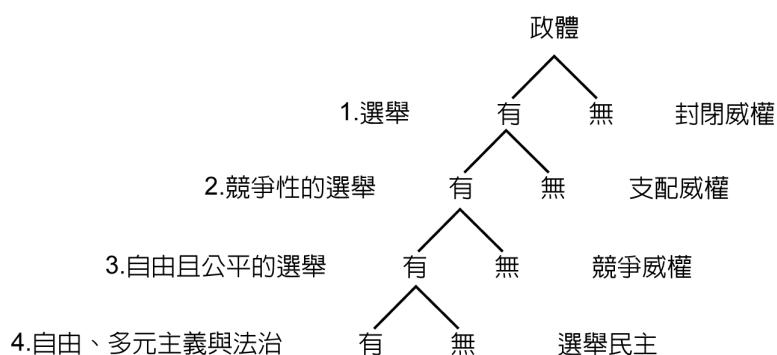
二、政體概述與異同分析

依照 Giovanni Satori 對於政黨體系的定義，其認為必須考量到政黨的體系競爭性與政黨數目，前者係指稱在政治體系中是否存在公平且公開的選舉，後者則是以相關性政黨（relevant party）作為區分依據（Sartori, 2005）。細看現階段中國與戒嚴時期的臺灣之政治生態，現階段中國儘管存在諸多政黨，然而在國會與全國代表大會中，中國共產黨無疑是這些政黨中最具有影響力，且為中國長時間唯一的執政黨；中國無論在地方性乃至全國性的選舉，皆是受到共產黨控制的傀儡選舉，僅有共產黨當局屬意的候選人方能當選。戒嚴時期的臺灣在政黨數目上，僅有中國國民黨一個政黨，在有效選舉方面，從 1977 年的中壢事件便可以看出，國民黨仍是主導選舉的操縱者。

若將政治體系視為一個市場，現階段中國與戒嚴時期臺灣可被歸類為獨佔市場，即由一個主要政黨領導國家的發展。同樣具有獨佔性質的政治制度框架下，兩個國家卻有著不同的政治發展——同作為威權政體，為了鞏固政權生存必定會將人民之聲音禁錮，避免人民產生過多之意見而失其統治正當性；然而，臺灣於上世紀九零年代後便脫離威權體制，進入民主政體，中國卻不斷地對人民施以人權上的侵害。筆者認為，此兩者之差異不僅因其對現代化理論所認為的民主化推手——中產階級之態度有高度相關，統治階級對於人民「異議」之處理方式亦成為另一項造成兩者差異之因素。本文將會先對於戒嚴時期之臺灣政府以及當前中國政府之政府體制進行分析；並在此兩個政體間進行統治方式的「同中求異」之差異比較，探討為何皆是在非民主的框架下，兩個政體之政治發展走向卻十分迥異。

戒嚴時期的臺灣正處於與中共對峙之態勢，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後，便以「反攻大陸，解救同胞」之話語訴諸人民，期人民能夠服從政府之命令，達成彼時政府所欲達成之目標。而根據學者 Marc Howard 等多位學者對於政體之分類，並參考李冠和之觀點修改成下方圖表（Howard & Philip, 2006；李冠和，2013）。

圖 1 政體分類標準



資料來源：Howard & Philip (2006: 367)；李冠和（2013：76）

彼時之臺灣雖存在選舉制度，然此種選舉制度卻是受到中央政府之操縱，人民並無自主性選擇心之所向的候選人；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更藉由《檢肅流氓條例》對於「流氓」進行清肅，並以模糊之定義將異議分子定調為「流氓」以剷除之，故在缺乏競爭性選舉的制度與政府侵害人權之框架下，戒嚴時期的臺灣可以被定義為一個在「封閉式威權」與「支配式威權」之間擺盪的威權政體。值得一提的是，1970 年代後，臺灣因面臨退出聯合國所造成之統治正當性困境，致使中國法統地位失去說服力，蔣經國透過一系列的開放政策，即是透過臺灣逐漸地民主化、本土化，例如主張「吹臺青」，且「黨外」反對運動日盛，顯示出當時臺灣正面臨政治體制之轉型，即從一個受到高壓控管的環境中脫離，慢慢的走向多元化與開放。另一方面，中國政府雖在其《憲法》明文寫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權力屬於全體人民。」

然實際上現階段中國政府不斷透過「鎮壓」、「維穩」之方式對人民進行統治，透過箝制人民之言論自由、行動自由、新聞傳播自由等，進而維持其統治正當性（徐斯儉，2010）。同時，在選舉方面，中國政府亦對於選舉之結果進行影響、控管，中央政府在地方上安插中共所屬意之人，透過高壓、恐怖等方式治理地方。無獨有偶地，現階段中國與彼時的臺灣相同，在資訊、經濟方面都展現了一定之開放程度，如開放社群軟體（微信、QQ、微博等）或鼓勵民間與企業向外投資，在社會面向上同樣展現了多元化的樣貌。故現階段中國之政治體制在政治體制表現上，既不是封閉威權，亦非支配威權，而是學者高頡運用 Juan J. Linz 與 Alfred Stepan 對非民主政體的分類為基礎，提出之「後極權主義」，即國家透過一種「既允許又開放」之多元性，又稱為「被管理的多元主義」，在政治敏感的議題外，人民享有一定的社會多元性（Balzer, 2004）。

因此，戒嚴時期的臺灣與現階段中國皆是透過開放多元性、民主性之方式，達到鞏固政權之目的。然而，此二者採用這種政策之政治後果（political consequence）是截然不同的。筆者認為，在這種多元、開放的政治環境底下，戒嚴時期臺灣與中國政府對於人民異議之控制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中國政府會透過削減人民選擇「抗議」之誘因，使政權不受到人民意見之威脅，從而達到維持威權體制之樣態。

三、「叛離－抗議－忠誠」賽局模型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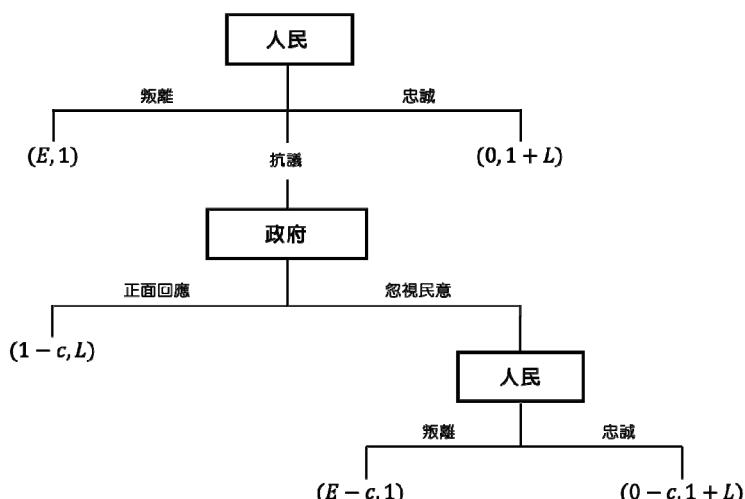
經濟學者 Albert O. Hirschman 在其著述《叛離、抗議與忠誠：對企業、組織與國家衰退的回應》中提出了國家（state）與人民（citizens）互動的模式，雙方透過不同的策略以回應對方所採行的決定，因此國家與人民兩者雙向的互動可以形成一層層的賽局，稱為「叛離－抗議－忠誠」（Exit-Voice-Loyalty game, EVL game）賽局（Hirschman, 1970）。本文採用之模型為學者 William R. Clark 等所建構之框架，其指出 EVL 賽局的原點來自於政府施行一項造成人民利益受損（deleterious）的政策，面對政府的決策，人民可以在考量政府會如何回應後選擇叛離（exit）、抗議（voice）與忠誠（remain loyalty）。相對應地，政府可以選擇正面回應（respond positively）人民的抗議，抑或選擇忽視（ignore）民意，使得人民得以選擇叛離或繼續對國家保持忠誠（Clark et al, 2017）。

（一）擴展形式的 EVL 賽局

根據上述的模型基本框架，可以繪製出擴展形式（extensive form）的賽局架構。其中，本文給定以下條件：令人民叛離的利益為 E ，政府從人民的反應所得的利益為 1 ； L 代表政府從未叛離且保持忠誠的人民中獲得的利益， c 為人民選擇叛離的成本，其中 c 與 L 皆大於 0 。

面對政府的決策，若人民選擇保持忠誠，那麼人民的利益不會因此減少，也不會因此增多，因此在模型中定義為 0，而政府則可以從忠誠的人民中獲得額外的利益 L 。此項額外的利益包含人民因噤聲選擇支持政府形成的「合法性」(legitimacy)，亦即為政策進行無聲的背書，又或人民因認同該項政策，從而進行投資。另一方面，假設人民對於政策感到十分不滿，其可以選擇移民他國，在沒有原本國家政策束縛之下，這些人民獲得 E 的利益；其亦可選擇上街示威、遊行進行抗議，必須付出成本 c ，這些成本包含時間成本、金錢成本、號召成本等。政府在面臨人民抗議之決策後，則需於正面回應與忽視之間選擇。政府如果選擇正視人民的需求，其將會轉移原本獲得的利益 1 純去選擇抗議的成本 c ，政府將會從抗議中選擇保持忠誠的人民中獲得利益 L ；政府若選擇忽視人民的需求，則人民將有機會在叛離與保持忠誠之間進行抉擇，假設人民選擇叛離，則其會獲得利益 E 並減去原本抗議的成本 c ，此時政府的利益不增不減，即維持原本的利益 1，而若人民選擇維持忠誠，那麼其利益將維持不變，但必須減去抗議的成本 c ，政府則可以從這些保持忠誠的人民中獲得利益 L 。

圖 2 EVL 擴展形式賽局



資料來源：Clark (2017: 5)

(二) EVL 賽局之奈許均衡解

定義賽局之架構後，吾人可透過逆向歸納法（backward induction）求得此賽局的奈許均衡解（Nash equilibria）。以下分為兩個條件討論，首先給定 $E > 0$ ，也就是 $E - c > 0 - c$ ，此時人民將會選擇叛離，此條件代表人民主觀認定其叛離國家的利益較對國家保持忠誠還要來得大。下一層即為政府之決策，給定正面回應的利益 $(1 - c, L)$ 與忽視的利益 $(E - c, 1)$ ，若 $L > 1$ 則代表政府有誘因選擇正面回應人民，反之則選擇忽視民意。若政府在多方衡量後選擇正面回應人民，則此賽局便返回第一層，此時人民必須在 E 、 $1 - c$ 與 0 此三項利益之間進行選擇，然此賽局已給定 $c > 0$ 之條件，則 $1 - c$ 必小於 1，因此便需考量 E 與 $1 - c$ 兩者的大小：假設人民已經無法繼續容忍政府執行的政策，執意透過移民之方式離開國家，便隱含 $E > 1 - c$ ，而若人民認為目前與政府有談判之餘地，那麼人民便會選擇以抗議之方式訴諸民意。

假設給定 $E < 0$ ，隱含 $E - c < 1 - c$ ，此時人民便會選擇保持忠誠。重複上述的推論步驟，政府必須在 L 與 $1 + L$ 之間進行選擇，但明顯地在給定的條件 $L > 0$ 之下，政府必會選擇忽視民意。

最後返回第一層，人民將會在 $E - c$ 與 0 之間抉擇，不過注意到此情況係已給定條件 $E < 0$ 與 $c > 0$ ，因此人民必會選擇維持對於國家之忠誠。

四、戒嚴時期臺灣與現階段中國的「噤聲」策略

綜觀戒嚴時期臺灣與現階段中國政府對於民意的處理策略，吾人可以將此兩個在政體上形同質異的國家置入前述之 EVL 模型中，對於戒嚴時期臺灣與現階段中國政府回應民意之模式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試圖釐清兩政權在相似之政治體制架構之下，為何會走向不同的政治後果。

(一) 戒嚴時期臺灣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甫結束，國民政府接管臺灣後，政治與社會上便產生了一連串的危機與問題，包含二二八事件、惡性通貨膨脹等，造成政府在彼時臺灣人民的心目中猶如魔爪般，處處控制人民但卻未使社會、經濟進步；國民黨對於社會之控制力道不僅強度很高，且具有效率—透過一系列的恐怖統治措施，警備總部肅清匪諜，控制人民對於國民黨執政合法性之懷疑，並不斷以「中國法統地位」作為鞏固其統治正當性之政策。後自韓戰開始，美國開始重視臺灣在政治與軍事上的地位，從而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相關協定，包含〈肥料供應合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並給予諸多經濟上的援助（俗稱美援），造成臺灣社會對於美國之依賴與崇拜，使得 1960 年代之臺灣社會流行一句順口溜：「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面對彼時政府的嚴格管控，加上 1970 年代初期臺灣退出聯合國的事件，使人民對於政權的信心急劇下降，造成移民美國的人口大增。龍文彬、黃國樞提供了戰後臺灣移民至美國的人口統計數據，其中臺灣地區移居美國的人數，從 1960 年的 12,280 人，到 1970 年的 55,758 人，最後於 1980 年攀升到 178,406 人（洪玉儒，2006；龍文彬 & 黃國樞，2002）。

在社會瀰漫著移民的氛圍時，人民對於叛離國家顯得十分嚮往，逃離臺灣島的利益相較於留下來得更大，從而使得人民接二連三的選擇移民，隱含 $E > 0$ 。面臨如此龐大的移民熱潮，國民黨政府仍未下定決心全面開放人民移民至他國，對於人民移民之選擇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決策，政府選擇以忽視代替直面回覆人民的需求。實際上當時的人民出國並非件易事，由於仍處於戒嚴時期，彼時臺灣人民若欲出國，在《國民申請出國觀光規則》未頒布之前，需經警察機關核轉至警備總司令部入出境管理處（現移民署）進行查核，且必須有「正當理由」方能出國，如外交、留學、商務等原因。故對於人民來說，逃離臺灣島只是一時，且誠如上述的種種原因，在制度方面便難以施行，導致人民選擇抗議、挑戰國家是叛離國家之外另一個疏通民意與民怨的管道。

端視國民黨選擇忽視民意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下，高強度的非民主的統治方式仍舊壟罩著臺灣人民，如中壢事件、橋頭事件與美麗島事件等等，均顯示出國民黨政府依舊不允許人民進行抗議和挑戰國家，如此態勢即形成 Hirschman 所定義之緊繩性經濟（taut economy）：一個充滿警覺性（alert）顧客的市場，不存在任何轉圜餘地。在國民黨「緊繩性經濟」之框架下，由於人民不被允許進行抗議，對於國民黨政府抱持忠誠亦非一項好的選擇，從而使得人民不滿的情緒在接連不斷的抗爭活動下不斷累積。Hirschman 提到，在緊繩性經濟中，對於組織或企業最危險的莫過於顧客或成員持續累積不滿情緒，不具有任何宣洩出口，到最後便會於臨界點爆發。Hirschman 的理論恰好反映在國民黨執政末期的社會運動上，國民黨的強壓政策事實上提供了反對勢力組織、動員以及本土派興起的能量，最終迎來國民黨威權統治的衰亡。

(二) 現階段中國

現階段中國自 2013 年習近平上任以降，似乎陷入一段「文字獄」盛行的年代。在網際網路盛行的二十一世紀，上世紀前正在經歷政治與經濟改革的中國也搭上了這個浪潮，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截至 2020 年為止，中國人民的網際網路使用率已高達 70%。事實上，阿拉伯之春提供了一項重要的經驗：社群媒體與平台不僅可以作為人民聯繫彼此、交流情感的地方，其更可以做為組織人民反抗威權政府的媒介(Al-Ani et al., 2012; Wulf et al., 2013)。根據 The Global Statistics 的統計，在中國境內使用人數最多的社群媒體平台前三名分別為抖音 (TikTok)、百度 (Baidu) 與微博 (Weibo)。

不同於戒嚴時期的臺灣，中國政府擁有比國民黨政府更加有效率的控制途徑，即是運用網際網路監視並審查人民的思想。根據 Gary King 等學者對於微博上面的貼文進行的分析，其發現若貼文有關「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被審查的頻次 (density) 將會大幅增加；另一方面，Gary 等人更指出在「集體行動」事件發生的前後，相關貼文刪除數較事件發生的前後的其他時間來得更多，例如 2011 年的內蒙古抗議示威事件、廣州新塘事件、艾未未被消失等事件(King, 2013)。筆者認為，中國政府刪除這些貼文係建立在不危害政權穩定的基礎之上，由於政府當局忌憚人民因為閱讀網路上的貼文從而對政府感到不信任，最後引起民怨甚至是大規模暴動，這些均是中國政府不樂見的。

若將中國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動套用在 EVL 賽局模型上，可以發現到中國目前對於人民移居國外的限制十分嚴格，政府多以控制疫情為由極力阻擋人民移民或進行不必要的旅遊，如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於 2021 年 8 月 4 日宣布非必要的出入境。

此外，若真的移民外國，其言論仍會被中國政府限制，對於真心想要離開中國的人民而言，叛離國家的利益並不會較其留在中國國內來得高；更甚者，微博官方於 2022 年 4 月 28 日，透過微博管理員的帳號發文表示，為了微博的健康生態，用戶必須顯示其 IP 屬地。言下之意是無論身在何方，只要使用微博進行發文，均無法避免受到中國政府的嚴厲審查，無疑使得叛離中國的人民之利益受損，也就是上述模型中提及的 $E < 0$ 。依據第四小節之逆向歸納法所得的小結，若給定 $E < 0$ ，則在賽局的第一開始人民便會選擇對於國家進行忠誠。筆者認為在中國網際網路發達的世代，政府會利用網際網路的便利性，讓人民能夠體認到政府所建構出的「多元性」，從而使人民形塑出「中國也有言論」的假象。另一方面，誠如上述所言，無論人民做何種選擇，最終均會選擇對於中國政府保持忠誠，那麼在第一開始便會選擇保持忠誠的行動，此一現象也漸漸形塑成網路上流行的用詞：小粉紅 (Little Pink)。

五、結論

本文首先就戒嚴時期臺灣與現階段中國的政治環境進行回顧，並就兩個政治體制之類型進行定義，以利後續之分析。筆者臆測，在這兩個不同政體之間，係處於相同之政治體制類型框架下，當時的國際政治環境與兩國之特殊關係，必須採用一定程度之威權統治方式，一方面維持國家安全，另一方面則能動員人民抵禦敵方；臺灣戒嚴時期末期與現階段中國皆具有「開放性」的政策，然而在現階段上，海峽兩岸存在著兩個截然不同的政體，一為民主的臺灣，另一個則是使用後極權主義的中國，此即為兩者在相同處之上所必須探討之差異。

其次，筆者藉由學者 Hirschman 之「叛離－抗議－忠誠」模型進行分析，發現戒嚴時期臺灣

與中國政府的差異，在於其對於人民意見之控制方式。國民黨於統治初期不允許人民採取叛離或抗議，且認為透過不斷強調中國法統地位即可使人民對中央政府產生忠誠，但事實卻是國民黨落入了繫繩性經濟的體制下，一方面使人民的不滿不斷累積，另一方面更提供反對勢力成長茁壯之機會，最後在臨界點時爆發，從而使人民能在與政府彼此對立的情況之下，不斷透過抗議的方式逼迫政府正面回覆人民的需求。不同於戒嚴時期臺灣的執政黨—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藉由允許人民選擇抗議之方式，在不危及中共政權生存的前提下，人民得以有叛離與抗議的選擇；而在此框架下，中國政府又透過提供公共財使人民對政府保持忠誠，使人民叛離後的結果並不會威脅中共政權。在中共雙管齊下的政策下，可以證成學者 Andrew James Nathan 所提出之「威權韌性理論」(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of China)，亦即中國透過高壓、維穩的方式，一方面勾勒出社會多元性的假象，另一方面則積極地透過網路審查的方式，防堵危害政權穩定的言詞進入人民的生活(Nathan, 2017)。

綜上所述，現階段中國政府對於民意的回應模式較戒嚴時期臺灣的國民黨政府還要來得更加有彈性，兩個政府對於民意的控制、處理模式不盡相同，因而造成兩相似政體在經過一連串的事件後，造成迥異的政治後果。筆者認為，Nathan 所提出之中共威權韌性理論必會在近幾年不斷成長，例如近年來不斷躍然國際新聞的「辱華事件」，無疑是中國人民選擇對於共產黨忠誠的現象，在中國內部只要有人民對「小粉紅」的言論產生異議，便會慘遭出征，而這些現象都在預示著中國政府不斷地洗腦人民，深化「網路與社會多元性」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從而能夠鞏固政權之穩定性。

參考文獻

- 李冠和，〈選舉式威權政體：選舉競爭度，穩定性與民主化〉，《政治科學論叢》，57(2013): 69-114。
- 洪玉儒，〈美國台灣移民政策的現狀（1980-2004）〉，《中興史學》，12(2006): 153-196。
- 陳艾伶，2022，〈中國網路審查還不夠嚴？微博強制顯示用戶 IP 地區，網友諷：脖上項圈越來越緊〉，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4311273>，2022 年 9 月 1 日。
- 維基百科，〈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2022 年 9 月 3 日。
- 龍文彬、黃國枬，〈台灣及兩岸三地華人人口推估方法－理論構建與實證探討（以美國為例）〉，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2003：表 1-1。
- Balzer, Harley. "State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s from communism: 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Harley Balzer."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 Century China*. Routledge, 2004. 248-269.
- Clark, William Roberts, Matt Golder, and Sona N. Golder. "The British Academy Brian Barry prize essay: 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model of politic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4 (2017): 719-748.
- De Miguel, Amando, and Juan J. Linz. "Nivel de estudios del empresario español." *Arbor* 57.219 (1964): 261.
- Hirschman, Albert O.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Vol. 2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Howard, Marc Morjé, and Philip G. Roessler. "Liberalizing electoral outcomes in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2 (2006): 365-381.
- Khalil, Lydia.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China and COVID." (2020).
- Sartori, Giovann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CPR press, 2005.
- The Global Statistics. 2022. "China Social Media Statistics 2022 | Most Popular Platforms" in <https://www.theglobalstatistics.com/china-social-media-statistics/>. Latest update 9 September 2022.
- The World Bank. 2020. "Individuals using the Internet (% of population) - China" in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IT.NET.USER.ZS?locations=CN>. Latest update 9 September 2022.

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 第 143 期

Mainland China Studies Newsletter No.143

<http://www.china-studies.taipei/publish02.php>

發 行 者：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贊 助 者：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

榮譽主編：石之瑜（臺大政治學系教授）

主 編：張登及（臺大政治學系教授）

執行編輯：蘇翊豪（臺大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編 委 會：石之瑜（臺大政治學系教授）

 張登及（臺大政治學系教授）

 陳世民（臺大政治學系副教授）

 唐欣偉（臺大政治學系副教授）

 廖小娟（臺大政治學系副教授）

 蘇翊豪（臺大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編輯助理：陳聿伶、趙婉婷

地 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電 話：886-2-3366-8450

傳 真：886-2-2365-3433

印 刷 者：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電 話：886-2-2382-1120